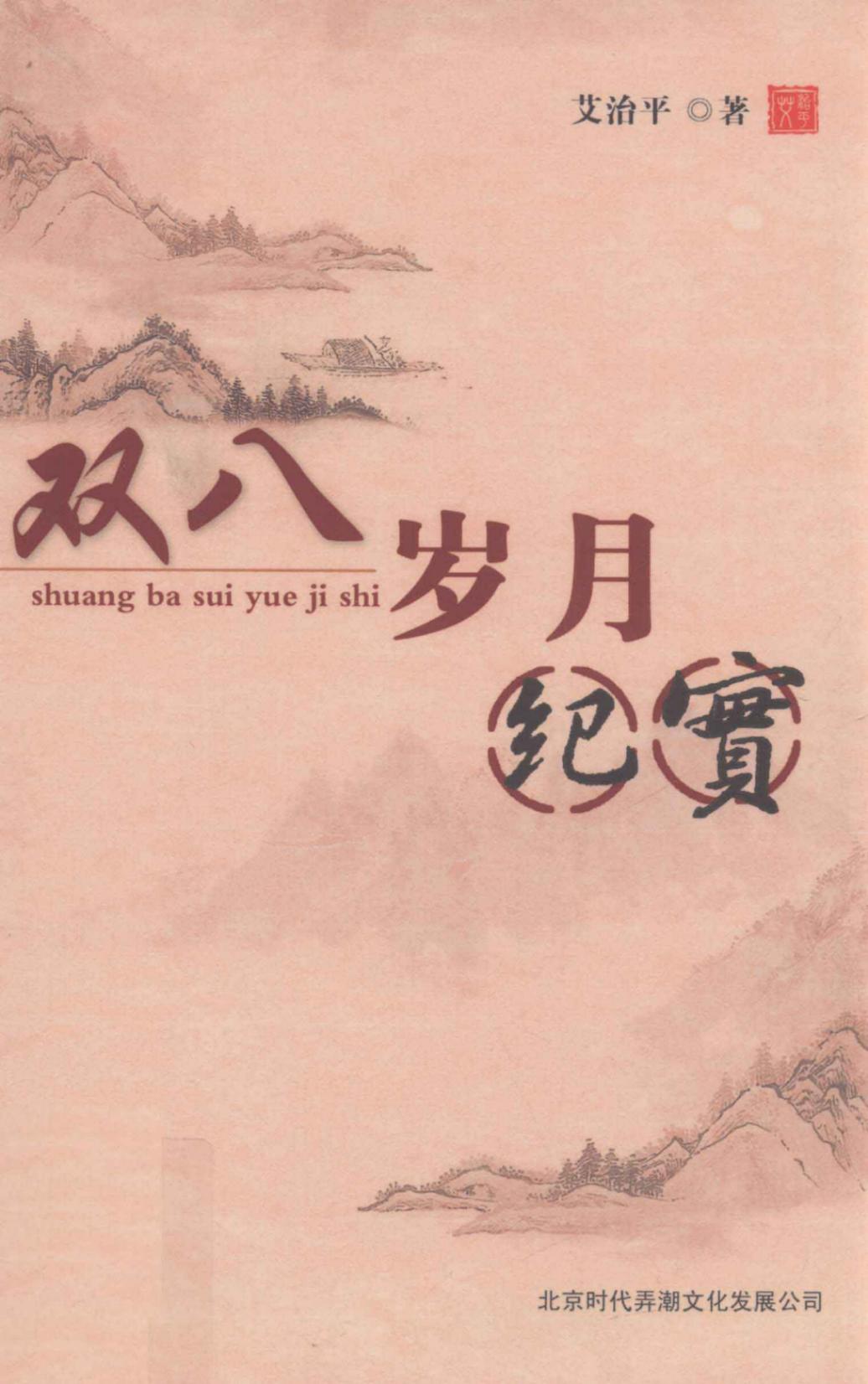


艾治平 © 著



双八 岁月
shuang ba sui yue ji shi 纪 实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双八岁月纪实

艾治平 ©著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双八岁月纪实

作 者：艾治平

编辑出版：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中关村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书店

联系电话：010-68920114 13693651386

网 址：www.grcsw.com

开 本：850×1168 1/32

版 次：2013年8月第1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写在前面

本书是继《人生有情》（上海学林版）、《人生自是有情痴》、《人生自是有情痴》（续编）（上二书作家出版社版）后的又一自传性著作。不过这次是重在“写北大”、“忆北大”。凡见于上三书者多数从简，择要登取。但也有三五篇我认为有意义、比较喜欢者，仍全文照登。其中多数取自“北京大学校友通讯”。这虽是一本“内刊”，但北大校友遍天下，所以发行量很大。仅缀此三言五语，以作说明。

艾治平（八十八岁叟）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五于岭南

目 录

写在前面

一、尊敬的北大师长	1
1. 向胡适校长致敬及其他	1
2. 在西斋所见所感	30
3. 季羨林追忆胡适文章读后	35
4. 纪念国学大师游国恩先生	43
5. 游国恩论诗欣赏	49
6. 访问前贤革命先烈李大钊故乡	54
二、我心中永远的丰碑	61
1. 我与北大	61
2. 谒红楼	105
3. 永忆红楼	109
4. 今日的北大感怀	114
5.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涯	124
三、序跋（前言）	133
1. 《婉约词派史》的序和跋	133
2. 李瑛《人生有情·序》	141
3. 韩石山《人生自是有情痴·序》	151

4. 林剑《人生自是有情痴·序》(续编)	154
5. 柯原《岁月无痕,人生有情》	163
6. 苏晨《名家评论艾治平著作·序》	168
7. 《名家品经典·花间集品读·前言》	174
8. 《名家品经典·清词品读·前言》	179
9. 《名家品经典·古代才女诗词品读·前言》	184
10. 《词人心史·跋》	195
——从电话中引出的话题	195
11. 《艾治平解读名诗·自序》	200
12. 《艾治平解读名词曲·跋》兼谈“老有所为”	204
13. 《艺妓诗事·玫瑰拂地红·导言》	211
14. 《艺妓诗释·序》(初稿)	221

四、永远怀念妻子和情人..... 226

1. 新婚纪实	226
2. 玉容来的第十二封信	228
3. 痛悼林蘅	231
4. 哭琦瑛	242
5. 忆武汉	253
6. 致蘋	256

五、我的两个二十三年

(1955年至1978年, 1990年至2013年) 260

1. 在军旅中	260
2. 炮火声中渡琼海	262

六、励志	270
1.生日	270
2.八十言志	275
七、友情往来录	280
1.秦牧、王季思等“亦师亦友”诸人评论	280
2.“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诸友人的鼓励鞭策与批评	289
八、特稿	314
1.愧对母亲	314
2.《七五前后》序	318
3.《七五前后》片断：“七·五”那一天	323
九、附刊（短篇小说两篇）	331
1.时代的波澜	331
2.飞黄腾达	369

一、尊敬的北大师长

1. 向胡适校长致敬及其他

(一)

似乎是很碰巧的事儿，我一九四五年夏天考入沦陷区的北京大学。未久，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收后，成立临时大学，进行“补习”、“甄审”。一年后考试及格，由公家分往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我十分幸运地分到北大。经过代理校长傅斯年“汉贼不两立”一番奋力冲杀后，是非已正，忠奸已辨大好形势下，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胡适校长偕儿子祖望飞回北平（江冬秀暂留上海），北平党政当局李宗仁、萧一山以及傅斯年、郑天挺、汤用彤等到机场迎接。八月十六日，胡适在蔡元培纪念堂主持北大校务行政第一次会议，安排布置暑期后新学年的全面工作，重点研究北大院系新建制和重要干部以及各系科教员的聘任等问题。

十月十日，北京大学在国会街北大第四院举行新年开学典礼。这是作为中文系二年级学生的我，第一次见到胡适校长。事隔五十六年，我把这次胡适校长在大会讲话的情景，写进我的自传性散文集《人生有情》（上海学林版）中。后来《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看中这篇文章，经我大作增补，以《听胡适校长讲演》为题又登在《山西文学》二〇〇六年第五期。再后来又收入他主编的《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陕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同年，我重作修订，又发表在《人生自是有情痴》一书

上。一篇三千字的纪实作品，五年间发表四次，我是颇感欣慰的。因为这是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至于易竹贤《胡适传》上说：胡适这次演讲引用宋儒“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注脚”，便是他演讲中说“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进而说：“当内战硝烟弥漫，青年学生向往民主自由进步，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众运动广泛开展时候，胡校长却反复申说这些人所共知的道理，用意还不明白吗？”我读书近十六载，经历校长副校长十来个，我从未听说他们在大会上公开讲：不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问题，到处晃荡，不必去读书，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郭沫若的话意简而明白，他说：“胡适平日蒙上‘自由主义者’之假面具，高唱‘理未易明，善未易察’之滥调，以乡愿贼德，毒害学生。”其他有人谈过自己的理解，胡适本人也有过辩解，这里就都从略了。

众所周知，胡适校长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留下一篇纪念北大校庆五十周年的文章和赠给北大的一百零二箱书，并一张给北大领导人的纸条：“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便急急匆匆地走了。他死时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至少对我是极大的安慰。

胡适离开北京大学两个月零五天，我辞别北大参加人民解放军。我以经历了他任校长的全过程为一生最幸运的事，会永远铭记于心。

(二)

如果从胡适校长主持北大校务会议那天算起，他任校长仅两年四个月。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岁的胡适，挟奠定了他学术地位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陈独秀编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第二卷第二期）登上人才济济的北大讲台，蔡元培以月薪二百六十银元，从第二个月起即增加到二百八十银元的教授最高薪礼聘。他第一年开的“中国哲学史”课，披荆斩棘，力辟新

路，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宣王以后讲起，并用《诗经》来作说明，称西周后期是“诗人时代”，那些不见经传的作家们才是真正的诗人。虽“骇得一堂中学生们挤舌而不下”（顾颉刚语），仍引起一些异议。后在本是旧学大师黄侃的弟子傅斯年一句话：“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风平浪静，胡适从此站稳了脚跟。此后，一九二二年四月，他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语系主任，他视自己为“北大人”。北大成就了他，反过来，北大因此而增色。但此次就任北大校长，虽壮志满怀，旰食宵衣，却天时不利，铩羽而归，那是神仙也救不了的。

但在如此短促的日子里，在百忙中，他仍兼任了中文系主任，用邓广铭的话说：“他很想把中文系某些教师的繁琐考证风气加以扭转，使他们能做到他所主张的‘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当然，胡适所做的不是一个系的改革这样的小事。众所周知，他提出过国家教育科学事业长远发展的计划，颇有创见，颇有价值。他一心一意要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他曾向政府建议在五年内集中财力发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在这几间大学之外的大学反对中央又无人鼎力支持下，未能实现。在胡适先生未就任前，便与北大理学院院长饶毓泰函商，一定要促使钱学森和郭永怀从美国返回在北大任教。对于胡适这种既高瞻远瞩，又点滴积累实事求是的教育思想，今人的“胡适传”有人作了详细公正的论述，是值得赞许的。

我虽然在胡适先生任校长期间“有始有终”，但我只是千百名学生中普通的一员，没有像学生自治会主席或理事们那样登门谈话（似用“协商”、“谈判”等字更宜）的机会，唯一一次“近距离”是我的《今日的北大》将出书时，我去校长办公室想请他题写书名，被在外间的邓广铭先生阻拦；后来见他从里间匆

忙出来，亦未敢提出。有一次在去北大北楼的路上遇到他，向他凝望一下，他微笑着颌首示意。许多年以后，在《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三十三期（二〇〇二年十二月）读到钟文典校友一篇《几点有关胡适的回忆》：

一九四七年三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从北楼教室出来，准备到图书馆看书。走到图书馆西墙下，刚好遇上胡适迎面走来。我站立墙下让他先走。出乎我的意料，他也停了下来，而且和蔼可亲地问我：“你有什么事需要我为你做的吗？”我有点受宠若惊，急忙向他回话：“谢谢校长，没有什么事。”听罢我的话，他点了点头，说一声“好的”就走了。

这位校友又说：他为家乡“定荣纪念小学校”题写校名挂牌事又去办公室找过胡校长，胡虽然说“我的书法不行，写不好啊”！当他知道这所小学是乡村“捐资办学”时，频频说“是好事，是好事”，最后还是为之题写了校名。虽然“土改”时毁掉了，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为定荣小学校题写校名”的记载，却留在荒远的《蒙山县志》上。

我自然很后悔，未敢向胡适校长当面提出要求。可是从他对我和钟文典校友（还有其他北大学生）的态度上，都可看出胡适这位名重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就是对一个非常平常的大学生也是那么的“平等待人”，丝毫不摆架子，多么富有人情味！试问我们今天的校长、党委书记：全校的教授你认识几个？全校的学生你认识几个？反正我这个不成材的教授，给刘人怀校长蒋述卓书记写过信，送过不止一本我写的书，全石沉大海，永世不得翻身。给后来的胡军校长、贾益民副校长等送的书，也杳如黄鹤，你们几位比比胡适先生的名望学问呢？我不说了；再说可能会扣上一顶“犯上”的帽子。

(三)

如果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胡适校长主持校务会议算他正式登场，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夜美兵皮尔逊在东单强奸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引起以北大为首的全市数千名学生大游行，实际他只过了一百三十天平静的日子。如果从举行开学典礼胡适校长对学生勸勉有嘉那天算起，则只有七十五天。似也没有人隐晦学生运动是中共地下党领导和指挥的。国民党政府的军、警、宪，自然心知肚明，就是满腹经纶从驻美大使任上下来的胡适校长也是一清二楚的。这次高呼“美国兵滚出中国”、“严惩美国凶手”响亮口号的全市大游行，冲上自“一二·九”学生运动以来古城蔚蓝的天空。此时胡适正在南京。十二月三十日他匆匆赶回来，和在南京他会见记者一样，对美国兵的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但对罢课，不表赞同；对学生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认为是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皮尔逊事件“不可并为一谈”。后来在国民党政府施压和教育部长朱家骅一再强调“纯属法律案件”以及外交部长王士杰的劝诫下，一月十六日上午，胡适驱车去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五团司令部听取美军事法庭开审皮尔逊；十八日又同沈崇父女再到美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军事法庭聆听。事隔多年后，我从《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十二期一九九三年九月）上，看到程树德校友有篇生动的记述：

初夏晚间，我和贾蔚文同学来到胡校长住宅。这是坐落在北平城一个被分割得不完整的四合院。贸然登门，门房通禀居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当时正值学运高潮，一般官员很怕招惹我们这样的学生）。我们被引进北屋，一明两暗，入东间屋就是会客室了。靠北墙列有三张沙发，呈品字形，靠南窗是一个大写字台。就在这里，我们两个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学生会见了名闻国内外的胡适大师。胡氏总习惯坐在靠东侧的小沙发上，我们则分坐

在他对面和侧面。他身穿淡黄近白色的长衫，黑色皮鞋。初次会面时，他询问了我们的姓名和来意，说这是他“第一次会见工学院的学生代表”，他很高兴，很愿意听听同学们的想法，了解同学们的处境。他的平易坦诚消除了我们的拘束，我俩便慷慨陈词……我们告别出来，胡送到走廊下……后来多次访晤中，看到的胡适先生是斯斯文文、彬彬有礼的，没有什么名人高官的架子和气派。这间小会客室，人们总是出出进进，比较随便，没有森严之感。著名的胡夫人，也时常在我们谈话中径直走进来和胡适商量些什么事情，胡适对夫人总是和蔼有礼。有一位男仆给我们端茶，端给胡适时他必称“谢谢”，这在当时中国家庭总是很少见的……一次也是在晚间，我们正在和胡谈话，电话铃响，胡起身接过电话用英语和对方讲话，最后他用英语说：“那么我保留抗议的权利。”随后，他坐下来对我说，刚才是美国的通讯社驻北平记者告诉他，沈崇事件的犯人回美国受审，现在可能要宣布无罪释放。看来胡适有些气愤。

关于这次学生运动，各种版本的胡适传或有关论胡适的书籍，毁誉不一，记述有异。这位程树德校友，我不熟识，他与贾蔚文是“工学院学生代表”。解放后我知道他在东北某单位作领导工作。这样的人不会讲假话。从这里既可看出胡适校长对沈崇事件尽了他所应所能尽的力量，并从一个侧面看到了他和被人们称为“没有文化的乡下‘小脚女人’江冬秀”生活的一面。至于桑逢康《胡适在北大》一书说：“这样一个‘时间差’（按，指胡适未立即回平），虽然不能说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对一个女学生的不幸熟视无睹，但至少可以说明对他来讲，制定所谓的‘宪法’，用‘民主’包装独裁，比处理一个女学生受辱重要得多，在他的心目中，‘蒋主席’的分量远非这个叫‘沈崇’的女学生所能比拟。‘当代的孔夫子’心中也自有一杆秤。”这位认为当今有“对胡适反共和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立场轻描淡写或视

而不见，过分赞誉其学术成就，甚至以胡（适）压鲁（迅）贬郭（沫若）”的作者研究员，言逾斧钺。十一月二十五日胡适代表主席团作“大会议事规则”报告。二十八日上午胡适担任大会主席。胡适为这部“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呕心沥血。十二月三十日他飞回北平对记者说：“（国大）圆满闭幕，尤属难得。我国有了一部很完整的宪法，国家定可走上康庄之境，目下虽有郁闷，大家要忍耐一时，光明前途可以立待”（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北平《华北日报》）。而当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蒋介石七十寿辰，胡适则借祝寿劝蒋介石下台。先是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晚，胡适当面指出蒋介石有违反宪法规定，当天他在日记中感叹：“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了吗？”终其一生，“当代的孔夫子”就是一个宪法迷，可爱的宪法迷！只是他太“孔夫子化”了。

我在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亲身目睹了北平的学生运动。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在全面的包围中》指出：“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我一九四八年参加到学生运动里面来。在《人生自是有情痴·我与北大》这篇近四万字的长文中，我用一万五千余字写了我的校长胡适之先生。虽然我从这以后又读了他和评论界的一些文章，但我的基本看法未变，这就是：

如果平心静气地从总的方面说，我们的校长胡适之先生还是爱惜学生保护学生的。以他的声望在动辄得咎的环境，维系北大的尊严，无违一位伟大哲人的良知！如果另换一位校长，未必会给学生运动带来什么好处。

在北平临近解放的一九四八年秋以后，国民党败局已定，困兽犹斗，狗急跳墙，有哪间学校没有被军警宪冲进来过呢？我

想唯有北大！胡适校长公然说：“名单（按，指国民党拟定逮捕黑名单）上的学生离校，他可以劝阻军警进校捕人。”有哪个学生是在北大校内被捕呢？没有！种种事实说明：我们的校长胡适保护了北大，保护了北大学生！这是我的结论。奉劝那些学郭沫若把蒋介石、胡适绑在一起“做文章”的人，读一读本文的第五节。

（四）

《韩非子·五蠹》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又，《八说》云：“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他反复说的道德，在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在我看来，胡适无论以任何标准看，都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蒋介石亲书挽联云：“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在风云诡譎、世事多变的二十世纪，“我的朋友胡适之”，虽有冒充的，但也说明人们对他的尊崇与企图。美籍华人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说：“胡适生前真可说是交游遍及海内外，上至总统、主席，下至企台、司厨、贩夫、走卒、担柴、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朋友’！”这是事实，并非赞叹。在北京，胡适家里的星期六总是座上客常满，杯中茶不空。台北卖芝麻饼的小贩袁颀给胡适写了封信，向他请教：“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贵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声名遍全球的胡适回了一封绝非应付而是充满爱护和人情味的信：

袁颀先生：

谢谢你十月二十三日的长信。

我细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地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的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

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丘吉尔在一九四五年离开唐宁街十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祝你安好

胡适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夜

从此大师与小贩书来信往，并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见面谈心。袁颺送上十个芝麻饼，胡适送了他《中国古代哲学史》、《四十自述》、《胡适文选》、《师门五年记》（罗尔纲著）、《旋风》（小说，姜贵著），并叮嘱他以后需要什么书，可以随时来拿。

胡适另一高尚道德是表现在他力倡“有容乃大”、“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容忍精神。《胡适的谦和雅量》的作者黄团元说：“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社会要自由，就需要‘容忍’！可以说‘容忍’表现了胡适追求自由的谦谦君子之风，体现了他温文尔雅的为人之貌，是他特殊的处世之道。”我认为这种“处世之道”在任何阶级掌权的社会任何时代里，都是鲜红的丹砂而不是砂粒或黏土，它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种和谐亲近的长桥，使人感到人世间的温暖，是胡适人格的光辉映现，为其一生所实践

了的。而人所共知的是，早年（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胡适和鲁迅的关系并不错。在这以后，由印度诗人泰戈尔应邀访华，鲁迅与“现代评论家”陈西滢发生激烈论战，胡、鲁渐行渐远，到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鲁迅写《知难行难》，便将一九二二年宣统邀胡适进宫，与“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询”两事并提曰：“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字里行间，如评论家云：“在鲁迅笔下胡适整一个‘叭儿狗形象’！”对于溥仪召见胡适，他去了；蒋介石垂询时政，他也去了。我看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胡适对于这种文字，抱定“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的态度”。对于周氏兄弟与陈西滢（陈源）的笔战，他以“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谆谆不倦地希望：“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不要回头踩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在我们面前，我们前进的方向是朝上走。”

鲁迅当然没有成为胡适“很敬爱的朋友”。他多次明讽暗刺胡适，后者却从来没有批评过他，仍以友好的态度相处，这是任何人难以否认的。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胡适在北平对新闻记者谈话中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见三月二十二日《申报·北平通讯》）。鲁迅对这样一条新闻报道，在《伪自由书》一文中斥责：“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此文以“何家干”的笔名题为《出卖灵魂的秘诀》）。此外，在